

/// 读本好书

# 蹀入岁月河 寻饮故乡水

## ——读潘小娴散文集《一树梅花一溪月》



■刘敬

唐末王贞白有诗云：“读书不觉已春深，一寸光阴一寸金。”由闲闲翻阅、随性浏览，至兴味盎然、心醉神迷，终至恋恋掩卷、回味犹甘，我才蓦然惊觉，时光的节拍早已由料峭轻寒、红梅傲绽暗换为天地澄澈、万物清明矣——此可谓书不负我，我亦不负春吧。实际上，我想强调的是，广东作家潘小娴

的这本散文集《一树梅花一溪月》，委实笔触细腻，诗意盎然，字里行间乡愁缱绻，犹如画卷，直教人油然而生发“今夕何夕，遇此佳著”之感慨。

散文这种体裁，貌似入手容易，人人可为，也因此形成了同质化、低质化现象。潘小娴却能独标高格，如梅开严冬，文字朴拙而灵动，深情又个性，极具辨识度。在《一树梅花一溪月》中，潘小娴恰到好处地采用了双重叙述视角，即一方面以童年的我——一个乡村姑娘、孩子的视角忆往事，吐心声，抒真情；另一方面，又以成年的我——一个媒体记者、作家的视角去追念、去审视、去反思，在铺陈描摹与今昔对比中，表达对故园山水、民俗风物、乡野美食及桑梓情深等的深深眷恋、浓浓乡愁与殷殷祝福……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法国作家罗歇·马丁·杜·加尔在长篇小说《蒂博一家》中感叹道：“永远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事物，这是童年的回忆。”是的，岁月流转，童年永恒，那些有趣的游戏、无邪的欢笑、奇异

的幻想、懵懂的心思、晶莹的委屈……如今都化成了一篇篇“直而不野，婉转附物，怛怛切情”的美文，在馨香的纸页间诉说着永恒。全书4辑作品，自《白鹅王子》开篇，由一幅“小姑娘撒腿跑，大白鹅展翅追”的“乡路晨趣图”，引领读者愉快步入作者年少时代的家乡，去领略、去感受、去体悟那一方天地的山水之美、民风之淳与孩童之趣等。仅以第三辑“翩翩小儿郎，骑‘马’上学堂”为例，小伙伴们春斗碧草秋斗蟋蟀，做把弹弓赶雀撵鸡，进山砍柴采摘野果，将铁环滚成风火轮……可谓童心纯纯、童真满满、童趣多多，直读得我这个“中年大叔”含泪微笑，世虑全消——童年，竟是个“全科医生”呢，它能治愈我们的一生。

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相仿，在童年的视角之外，潘小娴又以奔波十丈红尘、历经风雨沧桑的他乡人视角回溯自己的精神原乡，叙事中见热爱，描绘中溢深情，对比中透思考，追忆中蕴哲理。谁能想到，“白鹅王子离开我家是以生命的终

结”呢？谁能想到，作者家养的一只大白公鸡，却因奉献了两根雪白的羽毛，实实在在加深了瑶族和汉族乡亲之间的亲密友谊呢？谁能想到，曾经难见一口荷塘的小村，如今却是处处荷叶田田、荷花亭亭？谁又能想到，有着花儿一样美丽名字的梅村，从前因多种原因不曾植过一株梅，后来现实的图景却是“小溪边，梅花灼灼，映照得村中的溪水也晶亮了几分；梅花公园，白梅红梅，竞相绽放，映衬着村人的脸庞，也靓丽了几分”呢？

最是人间烟火暖，最是乡愁若酒浓。作者笔下的故乡梅村，既充满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又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喜的是，“梅村人家的小日子，如荷花盛开般，一天天圆满起来了”，明亮与美好成了主色调。然而，作者喜中有忧，因为在城市化、现代化潮流的冲击下，那些“生命和岁月中的独特气味与独特印记，正一步步地被剥离出去”，那些类似“美好一天，从与猪散步开始”“我挑着柴，哥哥站在桥头等我”“暖

暖光阴，与南瓜一起成长”等拙朴、怡淡、悠然的传统乡村诗意画卷已色褪影杳，这不能不令人惆怅、喟叹并深思……

值得一提的是，全书语言质朴而清新，明快又典雅，似溪流婉转，若花开嫣然。你看：“棟花风吹的四月天，紫烟袅袅，紫雾缭绕，村里的小芳们，穿梭在棟花风里，踢呀踢，跳呀跳，笑呀笑，一个个人比花还娇。”寥寥几笔，融情绘景，景中见人，人比花艳，如梦还似画，细品韵无穷。作者行文常慧心独具地运用叠词、双声叠韵等，情趣横生，极富音乐美。譬如，她写家乡的美食“水浸鬼”，“嫩滑爽溜，清冽冽，甜润润”；而村井呢，“一年四季，水漾漾，情满满”；她写家中的映山红，“一年年，枝枝缀锦，朵朵流霞，似乎，人间的一切欢聚、离散、喜悦、悲忧，皆坦坦荡荡，也不胜缠绵”……至于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及对古诗文的引用、化用等，更是信手拈来而又浑然天成，于此不再一一赘举，诸君得闲不妨细品，或会惊喜多多，赞叹连连。

# “砸缸少年”执着追求中的得与失

## ——读赵冬梅《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



■李庆林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赵冬梅凭借对宋史研究的深厚积淀，完成了这部《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此书不单单是“砸缸少年”司马光的个人成长史，更是一幅关于北宋时代全貌的叙事长卷，堪称既客观又真实。

赵冬梅在前言《我为什么要写司马光》中说：“我相信历

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于是，她笔下那个“砸缸少年”阔步而来：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千古的文正公，充满局限的大儒，也因过度执拗酿造悖论成为宽容政治的“掘墓人”……书中虽以司马光为主角，但难以避免关联到同时代的一些重要人物，他们都堪称璀璨巨星，如庞籍、王安石、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包拯、苏轼、苏辙等人。主要事件涉猎到庞籍罢相、苏辙对策风波、司马光与王安石的政治较量，以及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书仪》等等。书中还折射出司马光所处时代的官僚制度、官场生态、文化传统、社会生活以及民生百态等内容，着重刻画了司马光8岁起与恩师庞籍深厚的师徒之情，主要刻画分析了大变革时代下司马光与各方势力的思想交锋和政治角逐。

与此同时，该书以图文互证的表达方式，插入司马光的肖像、《资治通鉴》的残存手稿、相关人物的画像与墨迹等近40幅高清图画，大大增添了可读性与史学价值。

在阅读中我们看到，司马光属于典型的“官三代”。其祖父司马炫曾任富平县令，父亲司马池考中进士后步步高升，官居要职。司马池40多岁“老来得子”，他当时在光州的光山县做官，便给儿子起名司马光。司马光17岁时写有《功名论》，勘透君臣关系，少年立志不凡，18岁（宋仁宗宝元元年）考中进士第六名。而后，在长达19年的历程中，庞籍始终充当着司马光仕途官场的保护人。以庆历四年为界，司马光由“司马家的孝子”成为“大宋的贤臣”，不乏得益于庞籍的扶持。

书中的核心部分当然是司马光与王安石从友人变为不同政治理念的对立人。司马光先后经历了仁宗、神宗、哲宗三代皇帝，更是亲眼目睹了北宋失去宽容政治而陷入死亡漩涡。

他面对王安石变法思想推倒一切的负面恶果（价值观的撕裂、统治集团的分裂和社会的对立），执着地幻想北宋能够回归宋仁宗时期的宽容政治氛围，然而大势所趋，无可奈何。在宋神宗登基第二年启用王安石后，司马光便开始忧心忡忡。司马光并不反对变法，但他认为改革绝不是草率的全盘否定，尤应以宽容政治环境为重。在他与王安石最初标榜的立场渐行渐远时，王安石则明确表示司马光不能大用。后来，宋神宗任命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则因对政治环境的变化更为敏感，连上六札坚辞不就。韩琦遣专使快马从河北送信到开封力劝他“妥协”时，司马光仍坚持己见。主动请辞后，他前往洛阳，闲适自在，买下二十亩地，设计督造了一座“独乐园”，并在其间完成了《资治通鉴》和《书仪》的编撰。

宋神宗在罢免王安石11年后病逝，但王安石的变法政策仍在执行。10岁的赵煦（宋哲宗）继位，因其年幼，由太皇

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极为反对王安石变法，便又重用了司马光。

本就性格执拗，重新掌握话语权后，司马光则更加固执己见。虽然在政策方面，他认为朝堂之上，大臣们可各抒己见，最后由皇上甄别决策。但因哲宗年幼及高氏的过度信任和依赖，实质上的决策者反而成了司马光自己。原本主张宽容政治的司马光，最终成了顽固坚守个人立场的司马光，成了朝堂上的“一言堂”，酿造出“司马相业”中的“宽容政治悖论”。司马光在68岁时病故，死于积劳成疾，也就是说，他是累死的。

司马光委实爱百姓，但缺乏政治资源调动能力，又没有灵活的政治转圜手段，反使北宋错过了重构宽容的时机。司马光病逝41年后，北宋灭亡。

那个“砸缸少年”的执着追求，既造就了一代名臣的形象以及千古流传的《资治通鉴》，也自戕了宽容政治的宏大理想，既可幸亦可悲。